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研究

一、本文概述

本文旨在探讨朱子学如何传入朝鲜半岛，以及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发展和影响。朱子学，源于中国宋代的儒家学者朱熹，是对儒家经典的新解释和发展，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学说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半岛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然也受到了朱子学的深刻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朱子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概述，包括其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政治主张等，以便读者对朱子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接着，将详细探讨朱子学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的，包括其传播的背景、过程、主要传播者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将分析朱子学与朝鲜半岛原有文化的交互和融合。

本文还将研究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情况，包括其在朝鲜半岛的接受程度、在朝鲜半岛社会的应用和影响等。我们还将对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学派分化、思想演变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揭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本文将总结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评估其在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其在构建东亚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二、朱子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

朱子学，又称程朱理学，是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中国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其学说源于北宋五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形成理学的完备形态。南宋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的新的理学体系，这一体系后经明、清两代，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并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

朱子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北宋时期，程颢和程颐创立了“天理”说，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来认识“天理”。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学说，并进一步发挥了“理”的概念，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和规律，而人性中的“理”就是“天理”，即“性即理也”。朱熹还提出了“格物穷理”的方法，强调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认识和理解“理”。

除了对“理”的阐述外，朱子学还涉及了伦理道德、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多个领域。在伦理道德方面，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天理”所规定的道德标准，而抑制个人的私欲。在政治哲学方面，朱熹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但君主应该遵循“天理”来行使权力。在教育哲学方面，朱熹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认识能力。

朱子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教育和科举制度。在宋代，理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并渗透到教育领域。许多学者和教育家都致力于传授理学思想，其中包括朱熹本人。朱熹在各地讲学、著书立说，其学说逐渐得到广泛传播。科举制度也促进了朱子学的传播。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而朱子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分支，自然成为了考试的重要内容。许多士子为了应试而学习朱子学，进一步推动了其在中国社会的普及。

朱子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和完善，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科举制度等途径，朱子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朱子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并为其在朝鲜半岛等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途径与过程

朱子学，即朱熹的学说，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深远的影响。朝鲜半岛，作为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文化自然也与朱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朱子学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发展呢？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主要途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官方的文化交流与使者往来，二是通过民间的书籍传播与学术交流。

官方层面，自宋元时期起，中国与朝鲜半岛就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包含了文化层面的交流。中国的使者携带大量的文化典籍到朝鲜半岛，其中就包括朱熹的著作。同时，朝鲜半岛的使者在中国访问时，也会接触到朱子学的思想，从而将其带回本土。

民间层面，书籍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朱子学的经典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等，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成为士人必读之书。一些朝鲜半岛的学者还前往中国留学，深入研习朱子学，回国后则成为传播朱子学的重要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朝鲜半岛的学者在接受朱子学的也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解读与发展。这种本土化的朱子学，既保留了朱熹思想的核心内容，又融入了朝鲜半岛的文化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鲜半岛朱子学。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既包括了官方的文化交流，也包括了民间的书籍传播与学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朱子学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朝鲜半岛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源于中国宋代的朱熹学说，后经由多种途径传入朝鲜半岛，对当地的文化、政治、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朝鲜半岛，朱子学不仅成为官方哲学，更在民间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成为影响韩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可追溯至高丽朝末期。当时，一些朝鲜学者开始接触并研究朱子学，其中包括李滉（李退溪）和李珥（李栗谷）等杰出代表。他们不仅深入研习朱熹的著作，还结合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对朱子学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和发展。这种学术上的创新，使得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和传播。

在政治领域，朱子学成为朝鲜王朝官方哲学，对王朝的政治理念、统治方式以及官僚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子学强调的“天理人欲之辨”和“格物致知”等思想，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朱子学也强调君主的道德责任和仁爱之心，对朝鲜王朝的君主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教育领域，朱子学成为朝鲜半岛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朝鲜王朝时期，设立了专门的“成均馆”等教育机构，以传授和研究朱子学为主要任务。这些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大批的朱子学学者和官员，也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社会生活方面，朱子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朱子学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成为朝鲜半岛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在家庭伦理、人际交往以及社会风尚等方面，朱子学的思想理念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实践。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它不仅推动了朝鲜半岛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为朝鲜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朝鲜性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变异与发展

朱子学，源自中国宋代的朱熹，后经朝鲜半岛的学者吸收、传播，形成了独特的朝鲜朱子学。在朝鲜半岛，朱子学不仅被尊为官方哲学，更在日常生活、社会规范、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与此朱子学在朝鲜半岛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异与发展，形成了与中原朱子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体系。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朝鲜半岛固有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本土化的倾向。朝鲜学者在继承朱熹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对朱子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例如，在朝鲜李朝的朝鲜理学中，朝鲜学者将朝鲜传统的儒家理念与朱子学相结合，提出了“理气一体论”等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朱子学的内涵。

朝鲜半岛的朱子学在政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王朝将朱子学作为国家统治的哲学基础，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将朱子学的理念融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同时，朝鲜的士人也积极利用朱子学的思想来维护封建秩序，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朝鲜半岛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对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朝鲜半岛社会的变革，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尽管如此，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中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朝鲜半岛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中原朱子学的基本精神，又结合了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这种变异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朱子学的内涵，也推动了朝鲜半岛文化的繁荣和

发展。

六、结论

经过对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朱子学的传入并非简单的文化交流，而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它带来的不仅是学术上的繁荣，更是对朝鲜半岛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和更新。

朱子学的传入对朝鲜半岛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学的核心理念如“理”“气”“格物致知”等，与朝鲜半岛原有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朱子学体系。这一体系在朝鲜半岛的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制度、社会伦理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也应看到，朱子学的传入并非一帆风顺。在朝鲜半岛，朱子学经历了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冲突和再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朱子学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也展示了朝鲜半岛文化的独特性和创造力。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不仅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事，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它推动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启示。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朱子学的传入和影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资料:

朝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而建国。朝鲜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的故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1394年定都于汉阳（今首尔），翌年改称汉城。1399年迁回开城，1405年再次迁都汉阳。经过对北方的开拓，到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国土基本定型，大致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

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谚文的发明也为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了条件。对中国明、清两代采取事大主义，建国后便向中国朝廷称臣纳贡，自太宗李芳远至高宗李熙，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对日本等周边国家或部族则采取交邻政策。

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期，朝鲜接连遭到日本和后金（清）的入侵（万历朝鲜战争、丁卯之役、丙子之役），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中日甲午战争后不再称臣于中国。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暨朝鲜王朝灭亡，历27代君主、519年。

“朝鲜”一词本为东方古国的国名，高丽王朝开始将本国与“朝鲜”挂钩，并成为其别称。如高丽后期李承休所作《帝王韵纪》中如此介绍本国：“辽东别有一乾坤，斗与中朝区以分。洪涛万顷围三面，于北有陵连如线。中方千里是朝鲜，江山形胜名敷天。耕田凿井礼义家，华人题作小中华。”明太祖朱元璋赐高丽的诏书中写道：“咨尔高丽国王王颙，世守朝鲜……”。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将所拟国号方案“朝鲜”（箕子所建古国名）、“和宁”（李成桂诞生之地）上奏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选取新国号为“朝鲜”，理由是：“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李成桂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十五日钦奉明朝圣旨，定国号为朝鲜。在庄重场合下，朝鲜会冠以上国名号作为全称，如“有明朝鲜国”，《江华条约》以后开始使用“大朝鲜国”作为对欧美日本的正式国号。

因朝鲜王朝君主姓李，加上“朝鲜”二字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等），所以过去的历史学界一般习惯称呼该朝代为“李氏朝鲜”（简称李朝），古代存在的使用朝鲜为国号的国家则被称为“古朝鲜”以示区别。但是韩国认为，所谓“李朝”或“李氏朝鲜”是日本人创造的贬称，不应继续使用，而应正名为“朝鲜王朝”或“朝鲜时代”，于是“朝鲜王朝”的用语从1977年由韩国国语国

文学会开始提倡，到当代韩国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叫法。后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使用“朝鲜封建王朝”取代“李朝”，作为对朝鲜王朝的正式称呼。

14世纪末，高丽王朝经过长年战争和蒙古帝国的入侵已经岌岌可危。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国明朝派人来高丽宣告设立铁岭卫。高丽重臣崔莹借此准备与明开战，并派李成桂出兵入侵辽东半岛。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为地方豪族，任双城总管府千户。1356年，高丽攻其地，李子春投降。1362年，李成桂袭父职，在图们江、鸭绿江方面参与抵御女真族和蒙古残余势力入侵的军事行动。不久，他调京任职，后到南方抵御倭寇。1380年、1385年大破倭寇，威名日盛，参与军机中枢。

在威化岛，李成桂以江水泛滥渡江困难、粮食不足为由，再次要求禑王撤军。但是，撤军要求再次被拒绝，李成桂于五月二十二日自行决定开始撤退。这就是威化岛回军事件。李成桂发动兵变，推翻了高丽禑王的统治，崔莹被处死，禑王被流放到黄骊府。王禑之子王昌被立为王，其后李成桂又借口禑、昌父子本非王氏，以“废假立真”为名，另立王瑶为王。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清除了高丽宫廷反对派首领郑梦周。在流放王瑶到原州后，受群臣推戴，于七月十七日即位于寿昌宫

，建立朝鲜王朝，确立了对明朝事大的基本国策，结束了高丽王朝近 500 年的历史。推行科田法，奖励农业。李成桂还通过招抚、武力征服朝鲜半岛东北的女真部落，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辖，使其疆域达到图们江。倭寇在李成桂当政期间基本不敢再骚扰朝鲜。李成桂去世后，倭患再度兴起。

自从李成桂开创了朝鲜王朝之后，与明朝政府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宗藩关系，并且在前期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之下，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也发生过多内乱，大部分情况下政治状态尚算稳定。所以朝鲜王朝的前期被公认是朝鲜王朝的发展期，尤其是世宗大王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朝鲜王朝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世宗、世祖、成宗等几位贤君之后，后世朝鲜的国君大多昏怠而缺乏治国之术，则伴随着的便是党争的愈演愈烈与民生的困苦。这为后期朝鲜的吏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随着朝鲜新王位的产生和巩固，王位继承人开始成为朝鲜的一个问题。李成桂的五子李芳远在帮助李成桂登基中贡献是最大的。但在郑道传等重臣的游说下，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立八子李芳硕为世子。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二十六日，31 岁的王子靖安君李芳远发动军事政变，率兵冲入王宫景福宫，直趋东宫资善堂，将其异母

弟弟、年仅十七岁的世子李芳硕乱刀斩杀，另一异母弟弟、年仅十八岁的抚安君李芳蕃亦同时被杀。得手之后，李芳远率军又杀入了开国一等功臣、封号奉化伯郑道传家中。五十六岁的权臣郑道传此时正与其好友、世子的岳父沈孝生交谈，被乱兵砍死。史称“戊寅靖社”。

恐于王子互相残杀，李成桂决定立即引退并将王位让给二子李芳果，就是朝鲜定宗。定宗即位后便迁都回开京。建文二年（1400），朝鲜王朝再次发生变乱。为了争夺王位，开国功臣之一的朴苞与李芳干策动变乱，矛头直指掌权者李芳远。李芳远掌握下的定宗大王，唯李芳远马首是瞻，李芳远权势的滋长，刺激了李芳干的野心。李芳干不顾势力的悬殊，决心与五弟决一雌雄。李芳干趁兄弟狩猎之机，动员私兵加害李芳远，但是异谋早已为李芳远的鹰犬所侦知。李芳干无奈只好提前起兵，上王与定宗一再下谕劝阻无效。李芳远侧李叔蕃、李芳干侧孟宗、李成奇在开城竹善巷一带爆发巷战，李叔蕃射死李成奇，李芳干军奔散。李芳干势穷北奔，最后解甲卧地就戮被擒，流放兔山郡。

晚年的李成桂连夜出奔，躲回老家咸兴。此后，频繁派往咸兴的问安使接连在李成桂手下丧命，但是这阻吓不了凶悍的李芳远。两年，李成桂后被掳回汉阳，父子二人终于狭路相逢，李成桂被幽禁在昌德宫中，度过他生命最后的六年。朴苞之乱后，李芳远成为世子，十一月受禅为王，尊定宗大王为仁文恭睿上王。

朝鲜太宗开始发布法令巩固其王权统治。对内，太宗一改高丽王朝“君臣佞佛”的传统，崇尚儒学，学习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更是仿造明朝的体制，实行所谓“六曹直启制”。太宗的第一条措施就是解散王子和贵族的私兵，将兵权收归中央。私兵制度的废除有效预防了可能的反叛，并增加了国家军队中的士兵人数。太宗的第二条措施是修改土地税法，普查人口。随着新发现土地的增加，国家收入翻了一番。

太宗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太宗为夺王位杀死诸多异己和亲属，另一方面太宗治国有方，使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国防得到加强，为其王位继承者朝鲜世宗的统治打下良好基础。

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世宗在其父太宗退位前两个月登基。永乐十七年（1419）五月，世宗在太宗的建议和指导下己亥东征清除对马岛的倭寇。正统八年（1443），《癸亥条约》签订。对马岛大名被授权每年与朝鲜进行 50 船的贸易，向朝鲜朝廷进贡并负责防止倭寇对朝鲜海港的侵扰。

在北部边疆，世宗建立了“四郡六镇”用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宣德八年（1433），世宗派金宗瑞出兵攻打明朝建州女真诸部巩固朝鲜北方疆域。

在世宗统治期间，朝鲜的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世宗最为人纪念的贡献是创造谚文。由于世宗的功绩，世宗被尊称为“世宗大王”。但是当世宗去世后，训民正音并没有得到全面推广，上到官员的公文，下到老百姓间的契约依旧用的是汉文。

景泰元年（1450），世宗长子，朝鲜文宗即位。文宗基本上继续了世宗的政策，不过即位仅两年就因病去世。文宗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朝鲜端宗即位。端宗的叔父首阳大君李瑈在景泰四年（1453）发动癸酉靖难，杀死辅助端宗的重臣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掌握了实权。景泰六年（1455）闰六月十一日乙卯，首阳大君受禅于景福宫勤政殿，是为世祖大王。后来成三问、朴彭年等六位大臣密谋使端宗复位，事败被处以极刑，史称“死六臣事件”。事后端宗也被赐死。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世祖加强了王位的统治，使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近一步的加强。世祖下令绘制朝鲜详图，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对各个地区的所有军人和后备役人员实行人口统计，并强化了要求全体国民携带号牌（身份牌）的国民登记法。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亦在世祖时期开始编纂，被誉为“国家的立国磐石”。

成化四年（1468）九月七日，世祖传位于睿宗，次日在明政殿去世。但体弱多病的朝鲜睿宗即位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成化五年（1469）睿宗的侄子朝鲜成宗即位。成宗统治期间，国家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成宗重用士林派参政，设立弘文馆，并成立由儒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为治理国家献言献策，完善了包括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的朝鲜三司制度。成宗时期是继世宗后朝鲜王朝又一个文化发展黄金时期，大量书籍在这一时期发表问世。

成宗在位年间，除东北女真时有侵扰外，朝鲜内外均无大的忧患。而朝廷当中，已经俨然分成了勋旧势力和新进的士林势力两大派别。朝鲜王朝由此开始走向文恬武嬉、兵备废弛、党争加剧的时代。弘治七年（1494）十二月二十四日，成宗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

15世纪末，朝鲜王朝政治腐败，党争不绝。在燕山君统治期间，朝鲜发生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大批知识分子被屠杀。燕山君的生母废妃尹氏因被指控出于妒嫉毒害成宗妃子而被成宗赐毒酒而死。在得知此事后，燕山君杀死了指控尹氏的严、郑两贵人和支持赐死尹氏的官员及其家眷。对世祖篡位有偏词的士林派学者也遭到燕山君杀害。燕山君还搜掠千名美女为其作乐，把成均馆当成花天酒地的地方。由于有民众使用谚文书写传单痛斥燕山君，燕山君还下令禁止谚文的使用。正德元年（1506）中宗反正后，燕山君遭成希颜、朴元宗等朝臣

废黜，被流放乔桐岛，两个月后病死，得年三十一岁。因以暴君身分被废，因而无庙号、尊号、谥号、陵名等。

继位的朝鲜中宗是个平庸之人，只是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被推上王位。不过在中宗时期，中宗的大臣士林派首领赵光祖开展了许多大规模的改革。赵光祖建立了乡约以加强地方的管理，并通过土地改革降低贫富差距。赵光祖还通过发行简易本的儒学书籍在大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精简国家机构。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由于赵光祖的严厉监督，在这一时期朝鲜的官员无人敢收受贿赂或滥用职权。赵光祖的激进改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但遭到帮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勋旧派的强烈反对，并密谋陷害赵光祖。正德十四年（1519），赵光祖被赐死，史称“己卯士祸”。在随后的五十年中，朝鲜朝廷斗争不断。

朝鲜王朝的中期是朝鲜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吏治昏暗，宫廷内部各党派之间的权利斗争愈发惨烈，屡次发生政变与农民起义。而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日本挑起的壬辰倭乱与满洲贵族的两次入侵更是多次给予国家与社会以灭绝性打击。

士林派在燕山君、中宗和朝鲜明宗统治期间势力一直被削弱。朝鲜宣祖统治时期，士林派重新掌权，但很快分裂成为东人党和西人党两派。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与北人党。西人党又分为老论派和少论派。随着权力在这些朋党的更迭，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清剿和相互不断的报复。

万历十七年（1589）的己丑狱事就是其中一例。东人党的郑汝立有个抗击倭寇的组织，成员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个组织宣扬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其性质和目的受到人们的质疑。西人党的首领郑澈负责调查此事。郑澈指控郑汝立密谋造反，并借此事清剿与郑汝立团体有任何牵连的东人党。最终有千名东人党被处死或流放。

历史上朝鲜经常遭到倭寇的侵扰。朝鲜建立水师的目的就是抗击倭寇保护海上贸易。朝鲜海军使用神机箭（一种火箭推进式弓箭火车）来驱赶倭寇。

壬辰倭乱时期，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丰臣秀吉蓄谋以朝鲜为踏板入侵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带领装备有葡萄牙火枪鸟铳的军队入侵朝鲜。朝鲜宫廷中的党派纷争、对日本军事能力的低估以及外交调解的失利使得朝鲜迎战准备不足。装备有西方武器的日本军队，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浹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几个月内就占领南部朝鲜半岛。

不过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师在海上有效地摧毁日本军舰。朝鲜民间的游击组织对入侵的日本军队抵御也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派出大规模军队来到朝鲜，与朝鲜一道共同击退了入侵的日本军。虽然

朝鲜与明朝击败了日本，但损失惨重。事后朝鲜与日本断交，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倭乱为朝鲜王朝的历史写下沉重的一页，战争严重破坏了朝鲜社会，战后耕地缩减到战前一道水平（四五十万结），人口锐减到战前的六分之一，十万人被日本掠夺。壬辰战后，朝鲜户口锐减，因而人民负担大幅度加大，为加固国防而征收“三手米”（炮手、射手、杀手），以及增加其它维持国家所需的各种捐税。门户党争即使在倭乱中也不曾停止（结果李舜臣遭罢免），战后更加愈演愈烈，士大夫除此之外别无建树。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拥有战功的平民开始步入两班行列，两班失势初现端倪。同时，朝鲜王室第一次被外国欺凌，威信空前低落，社会各种裂痕在倭乱后一并显露，朝鲜王朝五百余年国祚实际上从此时开始衰亡。

壬辰倭乱使朝鲜国力锐减。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在中国东北统一女真族。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公布对明的“七大恨”后，开始攻打明。努尔哈赤和明都想联合朝鲜，使光海君处在进退两难之地。光海君打算中立。但由于明帮朝鲜击退了倭寇，朝鲜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支持帮助明打女真。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鲜就曾在萨尔浒之战中派兵支援明。天启三年（1623），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废。天启四年（1624），爆发李适之乱，叛乱被平定后，仁祖仍需驻军在汉阳部署重兵以维护首都稳定，从而导致防卫北部边疆的军力不足。

天启七年（1627），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带领 3 万女真部队入侵朝鲜。双方最后议和订立“兄弟国的盟约”。朝鲜派遣王子李觉赴后金为人质。后金、朝鲜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丁卯胡乱之后，后金和朝鲜的兄弟关系并不和睦。后金军一退，朝鲜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节”。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朝鲜大臣认为明朝助朝鲜击退倭寇，朝鲜理当与明朝交好抗击后金。因此朝鲜拒绝废除明朝年号，并依旧保持宗藩关系。这最终导致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仁祖之后的朝鲜孝宗，曾试图联合中国南方反清势力讨伐清朝，但无果。朝鲜虽然公家文书使用清朝年号，但在特定场合（如祭祀、墓碑及与明朝相关场合）却在使用“崇祯后纪元”，甚至持续到 20 世纪初。

在经历了前期的辉煌与中期的衰落之后，朝鲜王朝的后期可以视为一个滞止期与消亡期。这一阶段颇有一些朝鲜君主试图施展政治手段以恢复国家的力量，不过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功效。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使得朝鲜越发闭塞。而后来则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骚扰，最后更是由刚刚开化的邻居——日本，用洋炮轰开了朝鲜的国门，此后朝鲜便陷入了受列强支配的境地。

在倭和后金入侵朝鲜之后的 200 年里，朝鲜半岛一直没有外部战争发生。实学在朝鲜开始兴起。早期的朝鲜实学者主张一系列包括科举、税收、科技和农业技术的改革，旨在复兴被日本与女真损毁的国家。

朝鲜肃宗在位时，党争激烈，发生过 3 次“换局”事件，包括庚申换局（1680）、己巳换局（1689）、甲戌换局（1694）。朝鲜英祖为消除党派之间的消耗性斗争，并达到均衡，实行了“荡平政策”。朝鲜英祖和朝鲜正祖统治时期，朝鲜开始出现复兴。正祖统治时期开展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改革政策，得到实学者的广泛支持。朝鲜的社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嘉庆五年（1800），英正时代结束后，继位者多半年幼加上无嗣，而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外戚势力逐渐崛起，权倾朝野，家族内曾有多位女性成为王后，并有多人曾出任领议政，称为“势道政治”，王权旁落。直到同治二年（1863），朝鲜高宗即位，其父兴宣大院君摄政时逐渐削弱外戚势力，王权在朝政上的影响力才又有效巩固。

1860 年代中期，兴宣大院君的统治闭关锁国，迫害国内外的基督教徒。最终导致同治五年（1866）8 月法国派舰队攻打江华岛，法国战败，史称“丙寅洋扰”。兴宣大院君摄政初期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是修复景福宫。同治七年（1868），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平

壤靠岸，试图与朝鲜开展商贸外交，但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份船员被杀害。同治十年（1871），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

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外交上仍是无果，最后撤兵，史称“辛未洋扰”。

同治十二年（1873），兴宣大院君引退，高宗名义上正式掌权，但实权实际被高宗王后闵妃掌握。朝鲜宫中的高官都是闵妃的亲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光绪二年（1876）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光绪八年（1882），大院君利用壬午军乱掌权，后遭清军干涉，大院君则被带到中国幽禁3年。光绪十年（1884），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开化派金玉均等夺权，袁世凯率清军平乱，闵妃重掌政权。

列强的入侵和朝鲜腐败统治使民众不满。光绪二十年（1894）春，全琫准在全罗北道发起东学党起义，提出“辅国安民，斥倭斥洋，尽灭权贵”。高宗恐慌，向清告急。清派出 3000 军队与起义军达成停火。日本得知清派兵到朝鲜后，派出 8000 军队占领了景福宫，并成立亲日政府。此次事件最终升级成为甲午战争。随后，朝鲜政府在日本的策动下单方面宣布与清朝脱离藩属关系，并实行“甲午更张”。

开国五百三年（1894）十二月，高宗将自己的称号由主上殿下改为大君主陛下，王大妃殿下称王太后陛下，妻子闵妃由王妃殿下称王后陛下，王世子邸下称王太子殿下，王世子嫔邸下称王太子妃殿下，将王室成员的头衔一并升格。4月17日，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署，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战争之后，胜方日本所支持的大院君派得势。明成皇后失势后转而推行亲俄路线，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重建势力，因而引来了日本人的报复。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10月8日的乙未事变中，为清除亲俄势力，在日本驻朝公使的策划下，日本浪人袭击景福宫，残忍杀害了高宗的王后闵妃（明成皇后）。随后，日本逼迫高宗下“断发令”，强迫朝鲜人改变习俗，易服断发，导致民怨沸腾。如惊弓之鸟的高宗感到王宫待不下去了，就在亲俄势力主导下，于建阳元年（1896）2月潜逃出宫，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待了一年。

建阳二年（1897），高宗在朝鲜国内外支持独立的政治压力下，从朝鲜驻俄国公使馆回到德寿宫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成立，年号光武，并开展了光武改革。

光武九年（1905），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双方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11月17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

伊藤博文是日本在朝鲜的第一任统监。高宗为朝鲜王朝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一直悄悄进行着抗争。光武十一年（1907），他趁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机，派李相高、李儁、李玮钟三人为密使前往海牙，向西方陈述本国悲惨处境，呼吁西方列强干预。但未得到列强理睬，西方反而按照日本的要求拒绝密使与会。三人悲愤至极，李准更含恨病逝于海牙，长眠异邦。高宗此举惹恼了伊藤博文，他气急败坏地决定立即赶高宗下台。7月，高宗被逼退位，太子李坩继位，即后来的纯宗。隆熙三年（1909），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刺杀身亡。隆熙四年（1910），《日韩合并条约》签订。

1910年8月李坩的称号从“皇帝”被降为“李王”，仍健在的父亲高宗李熙则从“太皇帝”降为“李太王”，他们家族每年从日本那里支取一笔生活费用，表面上继续维持帝王生活，没有任何权力，活动范围也被限制。明治天皇去世后，特别是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每月支付的生活费减少到了几十日元，活动范围被进一步限制。

1919年1月21日高宗逝世。1926年，52岁的朝鲜纯宗李坩因病去世，其弟，末代皇太子英亲王李垠成为新一代李王。日本政府逼迫韩国王族与日本贵族通婚，其中高宗幼女德惠翁主被迫嫁给日本伯爵宗武志，本来就患有精神疾病的翁主，经历了各种磨难后病情进一步恶

化，直到 1961 年回国后才开始好转。

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光复，但在美苏两国的干预下，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部分。1946年，日本政府废除王公族制度，次年，韩国王室成员被开除皇籍，剥夺日本国籍，身在日本的李垠等旧王室成员希望回国，但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对朝鲜王室持敌视态度，生怕王室的支持者拥戴他们推翻自己，便百般阻挠。1954年韩国制定《旧王室财产处置法》，王室财产划归国有，留在韩国的王室成员被赶出王宫，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产被搜刮得几乎一干二净，王室成员每月发放生活费，而对李垠一文不付，纯宗遗孀尹大妃（纯贞孝皇后）甚至一度流落街头。

1960年，李承晚倒台。1961年，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善待旧王室，王室成员的生活得以改观，长期流亡国外的王室成员终于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故土。1970年，李垠逝世，韩国政府为其举办国葬。他的儿子李玖、侄孙李源（义亲王李垞之孙）先后成为李氏家族的首领。

朝鲜历代都把全国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道之下设州、府、郡、县。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鲜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

朝鲜高宗时期，曾实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鲜八道分为 23 府，但后来又再改成 13 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

在日据时代，朝鲜全境归朝鲜总督府管理，朝鲜总督府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鲜行政区为 13 道，218 个郡，2202 个县、28498 个里。

朝鲜王朝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李成桂建国之后，即命儒臣郑道传等讲究历代之典，按“仪章法制，拟定东、西（文、武）两班官制。十日后，官制颁布，确认了前朝仿唐制而行的门下府、中樞院和三司宰臣“合坐”都评议使司总揽国政的中枢机构组织模式。朝鲜王朝早期效仿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的办法，实行六曹直启制，六曹直接对国王负责，世宗后改行议政府署事制，六曹归议政府管辖。

成化五年（1469）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朝鲜王朝时期的官职

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朝鲜王朝的职官体系由来可以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是高丽王朝旧制，二是明清官制的影响。

正德五年（1510）后，朝鲜为了防备倭寇和女真而设立备边司，壬辰倭乱后，备边司权限大增，包揽了军国机务，成为朝鲜王朝后期事实上的国政运营中枢，造成了“事无巨细，无不归重，政府徒拥虚号，六曹皆失其职”的局面。同治四年（1865）废除备边司，恢复旧规。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废除议政府、六曹的官制，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新订官制，改六曹为八部、捕盗厅改为警务厅，以及废除科举考试等等，此即“甲午更张”。

朝鲜王朝的官职和官衔称为两班，等级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九品十八级。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甲午更张以后，修改职官制度，敕任官为正一品至从二品，奏任官为正三品至从六品，判任官为正七品至从九品。武将制度，大将为一品，副将、参将从二品，正领、副领、参领、正尉从三品，副尉、参尉从六品，正校、副校、参校另外决定。

在朝鲜国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为“领议政”，俗称“领相”。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俗称“左相”和“右相”，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

赞。再下有正四品舍人、正五品检详、正八品司录。

议政府之下有六曹（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同时期明朝的六部。其长官称判书（正二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副职称为参判（从二品），相当于中国的侍郎，往下有六曹参议（正三品堂上）、六曹参知（正三品堂上）、六曹正郎（正五品）、六曹佐郎（正六品），其中吏、兵曹的佐郎与正郎合称铨郎，享有特殊地位。监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合称两司，长官为大司宪（从二品）和大司谏（正三品堂上），下设有司宪府执义（从三品）、司宪府掌令（正四品）、司宪府持平（正五品）、司宪府监察（正六品）、司谏院司谏（从三品）、司谏院献纳（正五品）、司谏院正言（正六品）。此外还有承政院，下设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均为正三品堂上），为国王起草旨意。

宗亲、忠勋衙门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府、敦宁府等。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其他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史馆称春秋馆。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膳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府等。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衙门。

西班牙属衙门有五卫都总府（中卫：义兴卫、左卫：龙骧卫、右卫：虎贲卫、前卫：忠佐卫、后卫：忠武卫）、五军营（训练都监、御营厅、禁卫营、总戎厅、守御厅）、内三厅（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扈卫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总理营、世子翊卫司、世孙卫従司。长官称都总管（正二品）；训练都监：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训练大将（从二品）；御营厅：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御营大将（从二品）；禁卫营：都提调（正一品）、提调（正二品）、禁卫大将（从二品）；总戎使（从二品）；守御使（正二品）；内禁卫将（从二品）；兼司仆将（从二品）；羽林卫将（从二品）；扈卫大将（正一品）；捕盗大将（从二品）；镇抚使（从二品）；管理使（正二品）；禁军别将（从二品）；总理使（正二品）。兵曹下有义禁府，处理谋危社稷的人。

地方行政分八道，朝鲜八道辖境自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基本稳定，仅局部有所变迁。道下为大都护府、牧、都护府、郡、县。

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下设左右尹（从二品）。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水原府和广州府留守为正二品、开城府和江华府留守为从二品。汉城府判尹、左尹、右尹和四都留守属东班京官职。东班外官职为从二品诸道观察使、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正三品堂下牧使、从三品都护府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都事、从五品判官、从五品县令、从六品察访、从六品县监、从六品教授、从九品训导、从九品审药、从九品检律、从九品驿丞、从九品渡丞。中央外派官职有道观察黜陟使、都巡安使、按廉使。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朝鲜世祖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明朝灭亡以后，《大明律》在朝鲜的地位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通过礼讼较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大明律》地位的动摇和当时朝鲜

国内国际的形势，及在此情势下思想与文化取向的转变有关。南人集团为了取得执政权以革新政治，首先就要取得话语权，礼讼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甲寅礼讼之后，南人及之后的西人少论派为了推行更加务实的路线，必须突破之前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羁绊，其方法就是降低“时王之制”即《大明律》等明朝制度的地位，并对朱子学做出修订或新解，而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

朝鲜王朝实行人治军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西班外官职包括兵马节度使、兵马防御使、水军统御使、水军防御使、水军中军、（下三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三道水军统御使、三道水军统制使（均为从二品）；兵马节制使、水军节度使、巡营中军、镇营将（均为正三品堂上）；兵马金节制使、水军金节制使、兵马虞侯（均为从三品）；水军虞侯（正四品）；兵马同金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同金节制使、水军万户（均为从四品）、兵马评事（正六品）、兵马节制都尉、监牧官（均为从六品）、别将、权管别将（从九品）。

朝鲜建国前期，军备充足，规模最大时有军队近 15 万人（15 世纪后期）。军事制度以五卫制为主，军队分为五卫：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在中央设兵曹和五卫都总府统一掌管军政和军令。平时，五卫轮流承担宫禁警卫任务；战时，五卫赴前线作战。五卫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所属人员平时为农民，战时为士兵，士兵所需衣食兵器等物资全部自给自足，国家没有养兵的财政负担。

朝鲜太宗即位之后，通过废除私兵制和两次中枢改革，既实现了中枢机构军、政权力的分离，又瓦解了功臣“合坐”操纵国政的格局。

世宗大王即位后发动己亥东征。永乐十六年（1418）5月，忠清道、全罗道传来警报，倭船数十艘集结海岸，袭击朝鲜兵船。同月之内，黄海道海面也有倭寇出没，入寇海州等地，事实证明，朝鲜的和平手段付诸流水，倭寇依旧猖獗。王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己亥东征是朝鲜王朝仅有的主动向日本发动的军事反击。壬辰倭乱时，国内承平日久，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丙子虏乱时期，朝鲜君臣求和之切，军队毫无斗志，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朝鲜中期已经到了军备废弛的地步。为了提高军力，朝鲜君臣购得戚继光《纪效新书》，成立训练都监，训练都监成为朝鲜王朝后期三百年最重要的军队建制，开启了朝鲜军队职业化的道路。

近代以来，朝鲜王朝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通过改革建立了近代化的军制。建阳元年（1896），朝鲜高宗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期间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其中规定由俄国派遣军事教官训练朝鲜军队。光武三年（1899），高宗李熙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光武五年（1901）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了日本军舰“扬武”号。光武七年（1903）3月15日，高宗李熙下达诏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

尹雄烈奏请创设海军。

李氏朝鲜时期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税收以贡米为主，杂以少量地方土特产，很少征收货币地租。因此农业成为经济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确立了高丽末期开始的科田法，废除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婢。世祖在成化二年（1466）制定了职田制，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随着开垦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17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

朝鲜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鲜商人的主力。

18 世纪，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

到英祖时期，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 10 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一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后来因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鲜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 25 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 2000 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 2000 两白银的朝鲜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

从朝鲜输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马匹、貂、水獭、青鼠、豹等毛皮；海参、鲍鱼、虾、鱼、海带等海产干货；金、银、铜、豆锡、生铁、钢铁等金属；白纸、壮纸、桑皮纸等纸张；人参、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从清朝输入朝鲜的有牛、羊、骡、驴等牲畜；剪刀、镊子、针、床炉、釜、皮箱、马鞍、雨伞、木箸、算盘、梳子、纽扣、烟袋、眼镜、瓷器、毛绵纸、斗方纸、火石、火镰、笔、墨、砚、铜壶、锡壶、指南针等日用杂货；各种金属制品如铲、犁、铧、锯等工具；金、银、铜制钱等通货；棉花、棉纱、生丝等纺织原料；各种棉布；各种锦缎绫绸；各种男女成衣、帽子、鞋袜；各种染料；各种食品；各种药材；各种书籍；乃至进口珠宝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钗环首饰、自鸣钟、自鸣琴等西洋玩好、猫狗鹦鹉等珍禽异兽。

朝鲜商人的这种商业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的发展。倭乱之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此外汉城在 18 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已有了长足进展，19 世纪后贸易更胜往年。老百姓对诸如刀、文具、烟竹、衣帽、餐具、农具等手工艺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妇女戴装饰性假发的限制实际上也消失了。

朝鲜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制造了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

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了《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8 世纪初，实学派还将西方的地转说引入朝鲜。

世宗时代，编纂了八卷本《地理册》，按照一定的体系详细叙述了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相当于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与此同时编纂了各地的地方志，此后又编写了《东国舆地胜览》、《东国舆地备考》等地理书籍。地图方面，先后编纂了《八道州郡图》、《八道山川图》、《八道图》、以及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大东舆地图》。

医学方面，朝鲜王朝宫廷和民间编纂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书籍，许浚通过参考大量中国古医书于1596年编纂了一部《东医宝鉴》。还有《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本国经验方》等。

17世纪的实学家还深入研究研究西洋算学，洪大容编写了《筹解应用》，把古代算术发展到包括代数学和几何学在内的现代数学。

朝鲜王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农业书籍《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课农小抄》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了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

高丽时期发展了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并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了铸字所。

朝鲜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了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了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17世纪以后，朝鲜王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性理学派脱离了实际生活，陷于空谈。这时出现了实学派的思想。

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元在他的《蟠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建立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等措施。但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

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鲜出现了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丁若镛等实学大家，摆脱了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主张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朝鲜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改革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除了提出理论之外，实学派在农业、医学、数学、筑城学、工程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通过当时的中国吸收西洋的先进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李祹的积极推动下，学者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崔恒等人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音韵学，并在借鉴周边多种民族文字基础上，于15世纪创立了朝鲜民族文字。这是一种采用方块字字形的拼音文字，能准确记录朝鲜语全部发音，也能粗略记录其他民族语言的发音。

正统八年（1443），终于完成了符合朝鲜语音特点的文字标记体系，命名为“训民正音”。世宗亲自撰写序言，在序里阐明了创制新文字的目的，还对每个新创制出的字母作以概括性的说明并列举实例。然后由集贤殿的学者们对新文字加以更加详尽的说明，列举更多实例，编纂成《训民正音》一书，并刊行于世。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07062033126006055>